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昭明文選研究

ZHAO
MING

WEN
XUAN
YAN
JIU

穆克宏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昭明文选研究

穆克宏著



(京)新登字 002 号

此项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昭明文选研究/穆克宏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12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ISBN 7-02-002674-5

I. 昭… II. 穆…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8211 号

责任编辑: 刘文忠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63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125 插页 2

199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12.00 元

序

梁代昭明太子萧统所编选的《文选》一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个文学总集。在此以前虽已有晋挚虞《文章流别集》等书，现在均已散佚，其具体情况，已经难以确知。我们现在自然可以推测说，像挚虞《文章流别集》、李充《翰林论》这些著作，虽然对《文选》有过较大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实已难以详论。但从现在的史料看，这些著作在我国文学史上曾起过不可磨灭的影响，然就其影响之深远而论，恐怕也难以与《文选》并论。因为这些总集的影响，似乎仅限于一部分文人，主要是文论家，而《文选》的影响却要大得多。正如李善说的“后进英髦，咸资准的”；张𬸦《朝野佥载》记载，在唐代，甚至在乡学里也讲解《文选》。这是因为唐代重进士科，以诗赋取士，《文选》事实上已成为人们学习写作的典范。关于《文选》的影响，我们一般的理解，似乎比较注意诗、赋和骈文，其实它的影响还远不止此。即使是唐以后的散文家，也未必真正摆脱《文选》的影响。近人李详作《韩诗证选》，指出韩愈在诗歌方面得力于《文选》的一些例子。其实韩愈得益于《文选》亦岂止于诗，他的散文又何尝没有受汉魏六朝文的熏陶。只是这种继承关系，比较曲折，不易为人发现而已。不光韩愈，后来许多散文家，谈古文辞的作法，归根结底说到了“声气”、“音节”，其实所谓“声气”、“音节”，最后仍不免归结到平仄声等问题，所以和六朝文风，其实也是“殊途同归”。我们可以说，如果不研究《文选》，要弄清唐以前的文学，自然不大可能；就是理清

唐以后文学发展的脉络，恐怕也不很容易。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的研究者对这部名著似乎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比较复杂，我们可以姑置勿论。但是有一点却不能忽视，那就是《文选》产生于南北朝骈俪之风盛行的时代，而这种文风正是“五四”以来许多文学革新运动的倡导者们激烈反对的。在今天看来，那些革新运动的倡导者，虽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却也不免有其局限性和片面的地方。例如：六朝文学实际上是为唐代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六朝许多作家的努力，要出现唐代诗歌这样辉煌的成就，显然是很难想象的。在这里，《文选》一书的作用，尤其不可低估。我们知道，唐代大诗人李白，曾经三次模拟《文选》；杜甫也谆谆告诫他儿子要“熟精《文选》理”。这些例子都说明了《文选》一书在文学史上的重要作用。

当然，研究《文选》确实不是一件易事。早在三十年代，骆鸿凯在《文选学》一书中，就强调：“《文心》一书，本与《文选》相辅，今宜据彦和所述四义，以观《文选》纂录之篇，用资证明。”这要求就并非易事。因为如果对《文心雕龙》缺乏足够的理解，要深入地研究《文选》就比较困难。骆先生是“选学”的大家，他的话，确是道出了治《文选》之学的门径。在这方面，克宏兄可以说是充分地具备了这个条件的。他潜心《文心雕龙》的研究，所著《文心雕龙研究》一书，久已蜚声士林。他对魏晋南北朝文学又有着极深的研究，因此在研究《文选》时，往往能提出许多发人深省的真知灼见。

我作为克宏兄的老朋友，这许多年来，在选学研究方面，可以说是志同道合。在两次长春的《文选》研讨会，一次郑州的《文选》研讨会以及香港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研讨会”上，我们都一起参加，并且对很多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时即使略有不同看

法，但基本观点都相类似。这次他的大作《昭明文选研究》脱稿以后，嘱我写序，我自觉在《文选》方面，研究很少，但作为老朋友，又不应推辞。因此得以先读为快。我个人觉得，克宏兄这部大著，和过去一些关于《文选》研究的著作不同。过去的学者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很少涉及海外学者的著作，尤其对别人的研究成果很少提到，只是阐述自己的看法。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关于日本学者清水凯夫先生的意见。和克宏兄一样，我和清水先生也是同行好友，并且在多次学术会议上一起与会，互相切磋，颇得教益。在学术问题上，我和清水先生也有许多相同或类似的看法，例如关于《文选》编定年代的推测，大体上是一致的。但是关于《文选》的编者问题，正如同克宏兄一样，我和清水先生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关于刘孝绰曾经在《文选》的编纂中起过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不论是克宏兄或我，都是同意的。但《文选》的成书是否和萧统没有太大关系，主要出自刘孝绰之手，则颇可商榷。至少，《文选》的序言，明确地说：“余监抚徐闲”云云，分明是萧统的口吻。这样他对《文选》的内容至少应该负责，如果像清水先生说的那样，选录不少作品都是针对梁武帝的，并且意存讥刺，那问题就比较复杂了。我们知道，萧统是个孝子，丁贵嫔死后他如此地哀毁，又如何容得别人这样含沙射影地攻击他父亲？尤其是推定《文选》的编定在大通元年(527)以后，《南史》所载的“蜡鹅事件”已经发生，萧统还敢担当这个责任，是很难想象的。(当然，我对《南史》之说也有些怀疑，但总不会全无依据。)

然而，《文选》的编纂问题如果局限于它出于何人之手，毕竟是次要的。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它是根据什么原则编定的。从来的文学总集，都是根据一定的文学观点，由一定的编者来决定其选录某些作品，不选某些作品。这个选录标准一般是由编选者的文学观来决定的。然而正如一个人不可能完全自由地选择自

己的世界观一样，也不可能完全摆脱他的时代和传统影响来选择其文学观。因此，同一时代的文学家，其文学观点总或多或少地有其相同或类似之处；同时又由于各人的教养与经历等等因素的不同而多少会有所区别。因此在研究《文选》编纂者的文学观时，断言其全同于当时某一作家或完全不同于某一作家，都未必合乎事实，至于说编纂者能任意地出于个人爱憎等等非文学原因而取舍某些作品，恐怕都难以令人信服。在这里，我个人过去的一些看法，现在看来就很难成立。例如我为了证实刘孝绰曾经参加过《文选》的编纂工作，所以举出了徐悱的《古意酬到长史溉登琅琊城》，以及刘孝标的《广绝交论》等作品，认为其入选与刘孝绰有关，显然是一种臆测，因为刘孝标的《广绝交论》刻画当时的人情世态真是入木三分，不愧为南朝文的压卷之作；徐悱的诗，正如克宏兄所说，是“一首有文有质的佳作”，决非由于刘孝绰徇情才入选的。相反地，如果刘孝绰没有参加《文选》的编纂工作，那么萧统和他周围的学士们也同样地可以把它们录入《文选》。用这种方法来论证《文选》和刘孝绰的关系不免失之牵强。

同样地，在论证《文选》编纂者的文学思想时，我也不同意把他们和《文心雕龙》截然对立起来，却又认为他们和沈约完全一致。因为据《梁书·刘勰传》载，刘勰曾将《文心雕龙》就正于沈约，沈约对此颇为欣赏，“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如果《文选》编者的文学思想和沈约一致，那么，是否与刘勰完全相反，就大可研究了。在比较两位古人的文学思想时，抓住他们的片言只语，就此断言某甲与某乙相同，又与某丙相反是比较容易的，但这样能否得出科学的结论，却又很成问题。例如：清水先生认为《文选》的选录标准是依据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因为沈约提到的名篇，在《文选》中几乎全部入选。其实沈约所提到的

作品与《文选》相同主要是由于这些作品的成就最为突出。正如克宏兄所说：

因为《传论》所论为历代著名作家和名篇佳作，而《文选》，“略其芜秽，集其精英”，所选亦为历代著名作家和名篇佳作，它们不谋而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显然完全合乎事实。更使我感到心折的是，克宏兄指出：

《文选》选录的作家一百三十人，见于《文心雕龙》者五分之四。《文选》选录作品，在《文心雕龙》中指出篇名的大约有百馀篇。

这个统计数字十分有力，证明了同一时代的人，其文学观总有许多相近和相似之处。但要得出这个数字，非熟精《文选》和《文心雕龙》二书者不能办。

克宏兄研究《文选》多年，颇多精辟之见。他所论到的涉及《文选》的体例、文体分类、版本、编者及成书年代，还专门为萧统编了年谱，用力之勤，在我们同辈研究者中实为罕见。他的许多见解，都是长期深入研究的结果。

关于《文选》之学，我过去涉足甚少，近年来才开始进行一些研究，但距离深入的理解，还有不少差距。在阅读克宏兄大著以后，觉得深有教益，因此拉杂地写了上述的意见。

最后，还要声明的是，我认为学术问题本应各抒己见，朋友之间的切磋琢磨，本含有互相讨论的内容。在本文中，曾经对清水先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这些意见未必都对，还请克宏兄和清水先生指正。

曹道衡谨序

一九九五年十月一日

目 录

序	曹道衡 1
一 萧统的生平及著作	1
二 萧统的文学思想	9
三 《文选》产生的时代	19
四 《文选》内容简介(上)	26
五 《文选》内容简介(下)	30
六 《文选》研究述略	65
七 《文选》研究的几个问题	90
(一) 《文选》的编者问题	90
(二) 《文选》编选的年代问题	99
(三) 《文选》的文体分类问题	103
(四) 《文选》的选录标准问题	107
(五) 《文选》与《文心雕龙》的关系问题	111
八 《文选》的文学价值	116
九 《文选》与文学理论批评	132
十 《文选》对后世的影响	153

附录一

萧统年谱	166
------------	-----

附录二

一	梁章钜与《文选旁证》.....	199
二	研习选学之津梁	207
	——骆鸿凯《文选学》评介	
附录三		
	《文选》研究主要参考书目	215
	后记	218

一 萧统的生平及著作

萧统的生平事迹，主要见于《梁书》、《南史》。现在我们根据历史记载及有关资料，介绍萧统的生平及著作。

萧统是南朝梁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他字德施，小字维摩，生于齐中兴元年(501)九月，卒于梁中大通三年(531)四月，是梁武帝萧衍的长子。

其父萧衍，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今江苏武进)中都里人。汉代相国萧何的后代。在齐代，萧衍与竟陵王萧子良友善。子良爱好文学，开西邸，招文学之士，与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诸人游，号称“八友”。此后历任中书监、大司马、骠骑大将军、相国等要职。先后封为建安郡公、梁公、梁王。终于在齐中兴二年(502)三月，齐和帝禅位于梁王萧衍。萧衍于天监元年四月即皇帝位，建立梁朝。

其母丁贵嫔，名令光，谯国(今安徽亳州市)人，世居襄阳(今湖北襄樊市)。生于齐永明三年(485)，卒于梁普通七年(526)，年四十二。《梁书·丁贵嫔传》说：“贵嫔性仁恕，及居宫内，接驭自下，皆得其欢心。不好华饰，器服无珍丽，未尝为亲戚私谒。及高祖弘佛教，贵嫔奉而行之，屏绝滋味，长进蔬膳。受戒日，甘露降于殿前，方一丈五尺。高祖所立经义，皆得其指归。尤精《净名经》。所受供赐，悉以充法事。”于此可以想象其为人。

萧统出生时，萧衍年近四十，中年得子，颇为喜爱。天监元年(502)十一月，立为皇太子。这时萧统只有两岁，依旧居于宫

内。当时任命了一批东宫官员，如范云以吏部尚书领太子中庶子，王暕为太子中庶子，到洽为太子舍人，到沆、夏侯夔、褚球为太子洗马等。

萧统从小就很聪明睿智。三岁，老师就教他读《孝经》、《论语》，五岁已遍读《五经》，并且都能背诵。天监五年(506)六月，萧统出居东宫。他天性仁孝，自从出宫之后，常因思念父母而郁郁寡欢。武帝得知此事，太子每五日一朝时，便多留下他，住在其母丁贵嫔的住处永福省，住上三天五天再回东宫。

天监八年(509)九月，他才九岁，就在寿安殿讲《孝经》。他完全懂得全书的大义。讲完之后，在国学亲自行释奠先师之礼。十二岁时，他在宫内看到狱官判案，就问身边的人说：“这些穿黑衣服的人是干什么的？”身边的人答道：“是廷尉的官属。”萧统召见他们，看看他们的文书，说：“这些文书我都能念下去，我可以判案吗？”负责官吏因萧统年幼，就骗他说：“可以。”于是萧统斟酌案情，签署了意见：杖打五十下。负责官吏抱着判案，不知怎么办？就禀告武帝，武帝含笑依从了他。以后几次让他听诉讼，每遇有宽纵的案子，就让他判决。有一次，建康县将重罪轻判，萧统发现，就改判重刑。这说明萧统判案虽然以宽大为怀，但能依法办事，不徇私情。

天监十四年(515)，萧统十五岁。在这一年正月初一早晨，梁武帝于太极殿为萧统举行加冠礼。这样，萧统就算是成年了。萧统容貌端庄，举止适宜，读书数行并下，过目不忘。他参加游宴，赋诗常达数十韵。有时作剧韵(难押的韵)诗，也只要稍加考虑，便能写成，并且无需涂改。于此可以看出他卓越的文学才能。

北宋邵思《姓解》一书中有“昭明太子十学士”的说法。此说源自《南史·王锡传》。《传》云：“(王锡)再迁太子洗马。时昭明

太子尚幼，武帝敕锡与秘书郎张缵，使入宫，不限日数，与太子游狎，情兼师友；又敕陆倕、张率、谢举、王规、王筠、刘孝绰、到洽、张缅为学士十人，尽一时之选。”按《梁书·张缵传》，张缵任秘书郎时年十七，而缵卒于太清三年（549），年五十一，他十七岁时正是天监十四年。王锡与张缵同庚。

“十学士”都是东宫官员。王锡曾任太子洗马，张缵曾任太子舍人、太子洗马、太子中舍人，并掌东宫管记。陆倕曾任太子中舍人、太子庶子，掌东宫书记。张率曾任太子仆、太子家令，与太子庶子陆倕、太子仆刘孝绰对掌东宫管记。谢举曾任太子舍人、太子庶子、太子家令，掌东宫管记。王规曾任太子舍人、太子洗马、太子中舍人。王筠曾任太子洗马、太子中舍人，掌东宫管记。刘孝绰曾任太子舍人、太子洗马、太子仆，掌东宫管记。到洽曾任太子中舍人、太子中庶子，与太子庶子陆倕对掌东宫管记。张缅曾任太子舍人、太子洗马、太子中舍人、太子中庶子。他们与太子接触频繁，对太子的成长颇有影响。

萧统成年以后，其父梁武帝萧衍让他日省万机，文武百官的奏疏，都由他辨析可否。他评判案情，多所宽宥，所以人们都说他有仁义之心。他的性格宽和，能够容人，平时喜怒不形于色。他喜与有才学的人交往，常常和文人学士一起讨论典籍，谈古论今，还著书立说。

与萧统交往的文人学士中还有刘勰。刘勰是《文心雕龙》的作者。天监十年，为仁威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天监十七年，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萧统爱好文学，喜爱与他交往。从《文选》看，萧统显然受了刘勰的影响。

萧衍为了扩大佛教的影响，亲自登台宣传佛家教义。萧统也信仰佛教，读遍了佛教经典，并且在宫内建立慧义殿，作为集会之所。他还招引一些著名僧人谈佛论禅，自立二谛、法身义，

都有新意。普通元年(520)四月，甘露降于慧义殿，众人迷信，都以为是太子至德所感。

普通二年(521)秋，因为朝廷派大军北讨，京都谷价上涨。萧统因此穿着浣衣，食不兼肉，降低自己穿着和膳食的标准。每遇霪雨连绵，积雪封门，他常派遣身边心腹，巡视闾巷。看到贫困之家，或流离在外的人，都暗暗地给予赈赐。他还命人制作棉衣棉裤三千套，冬天用来救济贫苦受冻的人。有的人死了，穷得买不起棺材收殓，他就为他们准备棺材。每想到百姓劳苦贫困，他就面有忧色，这些都表现了他的爱民思想。

普通三年(522)十一月，萧统的叔叔始兴王萧憺去世。按照过去的规定，东宫太子礼绝傍亲，书信往来亦一依常式。萧统感到怀疑，命太子仆刘孝绰、仆射徐勉、太子左率令周舍、太子家令陆襄等讨论此事。司农卿明山宾、步兵校尉朱异认为“慕悼之解，宜终服月”。于是萧统令交付有关官员遵照执行，作为永久的准则。

普通三年，萧统二十二岁。他的诗文的数量已经不少，许多文人学士要为他编文集，而萧统只命刘孝绰编定他的文集，并且让他写了一篇序，可见萧统对他的重视。刘孝绰编定的这个文集虽已散失，而其序却保存下来了。萧统最重要的著作，自然是他主编的《文选》。《文选》是我国古代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被视为“文章渊薮”，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根据今人考证，《文选》大约于普通三年开始编选，完成于普通七年(526)以后(何融《文选编撰时期及编者考略》，《国文月刊》第七十六期)。当时萧统藏书近三万卷，许多著名的文人学士都聚集在他身边，如刘孝绰、殷芸、陆倕、王筠、到洽等同被礼遇。萧统还建造了“乐贤堂”，让画师先绘出刘孝绰的画像。所以史书认为：“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梁书·昭明太子传》)这为他编选

《文选》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明人杨慎说：“梁昭明太子统，聚文士刘孝威、庾肩吾、徐防、汪伯摇、孔敬通、惠子悦、徐陵、王围、孔炼、鲍至十人，谓之高斋十学士，集《文选》。今襄阳有文选楼，池州有文选台，未知何地为的。但十人姓名，人多不知，故特著之。”（《升庵外集》卷五十二）这是误以“高斋十学士”为“昭明太子十学士”。按“高斋十学士”系梁简文帝萧纲所置，杨氏考之不审，张冠李戴，遂贻误多年。此事经高步瀛等人驳正（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事已廓清，无需费辞。

萧统很善于处理身边文人学士中的矛盾。有这样一件事：刘孝绰作为廷尉正，携妾居官府，而他母亲仍住在私宅。当时任御史中丞的到洽调查属实，就参奏了一本。而刘孝绰的弟弟写了一封信，列举到洽令人不满的十件事，字里行间表现了对到洽的鄙视。同时另写一本，呈奏萧统，萧统接到之后，令人焚毁，看也不看。

萧统喜爱山水，所以在玄圃中建造亭馆，与身边属员和文人学士游宴其中。有一次，他于后池泛舟，番禺侯刘轨大谈此间当奏女乐，太子不答，吟咏左思《招隐诗》云：“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使刘轨感到十分惭愧。萧统很看重刘孝绰和王筠，常和他们以及陆倕、到洽、殷芸等人游宴玄圃。萧统一手抓住王筠的袖口，一手拍着刘孝绰的肩头，说：“这正是郭璞《游仙诗》中所说的‘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亦可见他对刘、王的青睐。

中大通二年（530），吴郡屡次因水灾，谷物无收。有人建议开凿沟渠以泻浙江之水。这年春天，朝廷派前交州刺史王弁（《南史》作奕）调吴、吴兴、义兴三郡人丁服劳役。萧统闻知此事，权衡利弊，上疏劝阻朝廷办理此事。他认为：“吴兴累年失收，民颇流移，吴郡十城，亦不全熟，唯义兴去秋有稔，复非常役之民。即日东境谷稼犹贵，劫盗屡起……今征戍未归，强丁疏

少，此虽小举，窃恐难合，吏一呼门，动为民蠹。”他的奏疏表现了恤民思想，得到梁武帝的表扬。

普通七年(526)，萧统母丁贵嫔去世，年四十二。其母病时，他朝夕侍疾，衣不解带。其母死后，他水浆不入，恸哭欲绝。表现了对母亲的孝敬之心。萧统的身体，腰带十围，原是很健壮的。因母死伤心，身体受到严重的损伤。

在丁贵嫔去世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当时，萧统派人求得一块好的墓地。将要除草时，有一个卖地的人通过太监俞三副要卖墓地。并跟俞三副说，若能卖得三百万，同意给他一百万。俞三副密禀武帝，说太子所得之墓地不如现在这块墓地对皇帝有利。武帝晚年多所禁忌，便命三副买下这块墓地。丁贵嫔下葬既毕，有一个道士善观墓地风水，说这块墓地对太子不利，若采用厌伏的方法，或可缓解。于是就制作了蜡鹅和其他一些东西，埋在丁贵嫔墓侧长子的位置。有宫监鲍邈之、魏雅二人，当初都为太子所宠爱。后来，邈之被魏雅疏远，邈之密禀武帝说：“魏雅为太子厌祷。”于是，武帝秘密地派人去挖掘，果然挖掘出蜡鹅等物。武帝大惊，准备追究此事。后为徐勉坚决谏止，于是只杀了道士就算了。但是由于此事，太子终身羞惭愤慨，而在他死后，他的长子萧欢也不能立为储君。

大通元年(527)，到洽、明山宾、张率先后去世。太子或举哀，或致赙，为之尽礼。他在与晋安王纲令中说：“明北充(山宾)、到长史(洽)遂相系凋落，伤怛悲惋，不能已已。去岁陆太常(倕)殂歿，今兹二贤长谢。陆生资忠履贞，冰清玉洁，文该四始，学遍九流，高情盛气，贞然直上。明公儒学稽古，淳厚笃诚，立身行道，始终如一，傥值夫子，必升孔堂。到子风神开爽，文义可观，当官莅事，介然无私，皆海内之俊乂，东序之秘宝。此之嗟惜，更复何论。……近张新安(率)又致故，其人文笔弘雅，亦足

嗟惜，随弟府朝，东西日久，尤当伤怀也。”（《梁书·到洽传》）对他们的去世，充满了悼念之情。

中大通三年（531）四月，萧统去世。关于萧统的去世，《南史·昭明太子传》记载是：“三年三月，游后池，乘雕文舸摘芙蓉。姬人荡舟，没溺而得出，因动股，恐贻帝忧，深诫不言，以寝疾闻。武帝敕看问，辄自力手书启。及稍笃，左右欲启闻，犹不许，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恶。’因便呜咽。四月乙巳，暴恶，驰启武帝，比至已薨，时年三十一。”按，明人张溥说：“《南史》所云，埋鹅启衅，荡舟寢疾，世疑其诬，于是论昭明者，断以姚书为质矣。”（《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梁昭明集题辞》）这是认为，“埋鹅”“荡舟”二事不可信，了解萧统的生平事迹应以《梁书》为据。“埋鹅”、“荡舟”二事，并为《南史》所增。《梁书》无。稽之《资治通鉴》、《二十二史劄记》等史籍，我认为，“埋鹅”事，当确有其事。至于“荡舟”是否可信，尚有待进一步考定。

萧统去世后，武帝临哭尽哀，并下诏以天子之服入敛。谥曰昭明。五月庚寅，葬于安宁陵。武帝诏司徒左长史王筠为他作哀册文。哀册文对萧统的一生和为人作了如实的概括。文中说他“外弘庄肃，内含和恺。识洞机深，量苞瀛海；立德不器，至功弗宰，宽绰居心，温恭成性，循时孝友，率由严敬。”又说他“沉吟典礼，优游方册，餍饫膏腴，含咀肴核，括囊流略，包举气文；遍该缃素，殚殛丘坟。……吟咏性灵，岂惟薄伎；属词婉约，缘情绮靡。字无点窜，笔不停纸；壮思泉流，清章云委。”（《梁书·昭明太子传》）考萧统之立身行事，这些赞颂基本上是真实的。

萧统的著作，根据《梁书》本传的记载，有《文集》二十卷、《正序》十卷、《文章英华》二十卷、《文选》三十卷。按，《文集》二十卷，已佚，今存明人辑本。《正序》十卷，《隋书·经籍志》未见著录，早已散失。《文章英华》、《南史》作《英华集》，当即《古今诗苑